

彭林◎著

中国礼学在 古代朝鲜的 播迁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

彭 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彭林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5

ISBN 7-301-08612-1

I. 中… II. 彭… III. 中国—礼仪—研究—朝鲜—古代
IV. ①K892.9 ②K893.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112 号

书 名: 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

著作责任者: 彭 林 著

责任编辑: 马辛民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12-1/G·14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1.25 印张 34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弁 言

就儒家化的程度而言，古代朝鲜是中国本土之外最为彻底的地区。

尽管中国与古代朝鲜在地缘上接壤，山水相依，但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原本却是非常之巨大。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属于汉藏语系，朝鲜属于阿尔泰语系，相互的沟通存在着很大障碍；从风俗的角度而言，两地更是大相径庭，这是见诸《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的。是什么力量使古代朝鲜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朝鲜的儒家化经由了怎样的途径？这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课题。不无遗憾的是，尽管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但很少有学者留意于此。

我原本研习先秦史，博士毕业后转向中国古代礼学经典和礼学思想的研究，从未涉足过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我对古代朝鲜的兴趣，缘起于1992年对韩国的访问，那是一次对我影响至深的经历，由于本书正文没有谈及，故有必要写在书端，以飨读者。

那年，中韩建交甫初，韩国国立庆尚大学宾荣镐校长和南冥学研究所所长孔泳立教授邀我前往作学术讲演。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我们对于朝鲜半岛历史的记忆，除了50年代那场刻骨铭心的战争之外，已经所剩无几。虽然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在我们心中却是那样的遥远和神秘。当时北京到汉城的直航尚未开通，我需要从天津登机，航线也非常曲折。从机舱内的大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升空后没有向东方的朝鲜半岛飞行，而是折而向南，越过河北、山东、江苏，然后在我的家乡无锡上空转了一个圈，飞向东海，接着折而往北，驶向济州岛。旅程漫漫，愈益增加了两国的距离感，韩国的面貌究竟如何？心中不免悬测种种。三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汉城上空，从舷

窗俯瞰这座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都城，万千的高楼竞相上拔，密密层层，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经济实力”、“繁荣”等词语。当晚，我在金浦空港转机前往庆尚大学所在的晋州，当飞机再次跃上汉城高空时，景观为之丕变，整个城市宛如盛满珠宝的巨盆，金光灿灿，炫人眼目。这就是韩国？

晋州是岭南的一座古城，历史上人文荟萃，素有“朝鲜人才，半出岭南；岭南人才，半出晋州”之说。这里一派静谧，与汉城的景象截然不同，人们似乎毫不理会汉城的奢华和喧嚣，从容不迫地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晋州农村，人们的生活相当富有，汽车和各类电器应有尽有，但几乎看不到欧陆风情式的建筑，视野所及，都是富有东方传统建筑特色的单檐歇山式的屋顶。门第较高的人家，室内显要处大多张贴着用汉字书写的古代名贤的文句，考究一些的，主人之位的背后往往有诗文书屏。这一切，无不显示着当地居民对传统的深深眷恋，向我们展示了汉城之外的韩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我的讲演结束之后，东道主安排我参观南冥先生的遗迹。南冥是朝鲜时代著名学者曹植的表字。曹植学识卓群，与当时的另一位大儒李滉（字退溪）齐名，时称“岭南双璧”。曹植痛恨黑暗的朝政，拒绝与政府合作，息影山林，主讲德川书院，以教授弟子为己任，其高风亮节，为后代所景仰。我们来到德川书院时，一群老者正围坐在书院的堂上开会，他们人人身穿“道服”，这是我国明代传入朝鲜的服装，如今我华已经不可得见。东道主介绍说，为了追思南冥的学业与精神，德川书院每年都要举行享祭。由于明天就是享祭日，所以与祭者正在商议祭礼的分工。分工的名单用毛笔书写在一张约一尺宽、两米多长的纸上，然后张贴在墙上。分工的名目有初献、亚献、终献、司炉、奉香等，与我国史乘或者古人文集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这些与我们久违了的名词，居然出现在异国他乡的德川书院，令人既觉惊讶，又备感亲切！当晚，我宿泊在德川书院附近，以便次日观礼。

享祭礼仪极其庄敬，古风流泽，扑面而来。司仪手持“笏记”（一种写有祭祀仪程的长条形手本），高声宣唱每一道仪式，几十位与祭

者有条不紊地上前执事、行礼。他们之中，有南冥先生的后裔，也有普通的村民，更多的是因为崇敬南冥而从四方专程赶来的儒林中人。这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有着他们终身固守的文化传统。用中国宋代的礼书来对照，享祭南冥的仪式相当正宗。古礼在中原湮灭已久，我以前只能在文献中从事研究，非常无奈。如今突然见到了“活化石”，枯燥的文献记载顿时变得鲜活起来，内心的兴奋真是难以言表。

其后数日，我又访问了许多学校、家庭、文化团体，闻见日增，而知中国古礼在韩国保存得非常完好，尤其是《朱子家礼》所规定的冠、婚、丧、祭四礼，至今还有人在遵行。庆尚大学汉文系定期为本系学生举行冠礼（成年礼），民间的婚礼依然奉行古代“六礼”的仪式。丧祭之礼则比较系统地存在于千家万户之中。全罗南道至今还有人在行古老的乡射礼。这一切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也让我发现了一块与我的礼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土地！从此，我开始将韩国文化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

为了全面地收集有关的资料，我于1996年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出申请，希望前往韩国考察6个月，得到批准。由此，我得以深入韩国城乡，从容寻访古礼，对于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血脉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刻，获益良多。古代礼仪，以丧礼最为隆重，不仅历时三年之久，而且仪式最为繁复，自古有“礼莫重于丧”之说。礼书中关于丧礼、丧服的记载不仅多，而且难以卒读。所幸的是，得力于在韩国的考察，使我得以较好地消化了这一部分内容，下面略举数例。

一次是韩国中央大学卢仁淑教授陪同我访问汉城的儒林会馆。儒学被韩国人视为宗教，各地都有儒学信奉者的组织，称为儒林支部，儒林会馆则是全国儒林的总部。会馆内有一个专门介绍传统丧礼的教室。经卢教授约请，一位年长的妇人接待了我们。她告诉我们，她的母亲一生在朝鲜王室从事内务，因而熟知宫廷丧仪。由于家庭的影响，她自己曾经帮助一百多家料理过丧事。她说，处理亲人的遗体，是家人对双亲最后一次尽孝，一定不能草率从事，否则会带来终身的悔恨。为了便于讲解，她用布料缝制了一个人偶当做教具，老

人面容慈祥，言谈沉稳，出现最多的词汇是“以洛开、以洛开”，意思是“这样、这样”。她甚至谈及对《仪礼·士丧礼》中“抗衾而浴”一语的理解，并作了演示，令我感慨不已。

另一次是到庆尚北道安东柳氏家中参观禫祭。某日，我到友人河有楫先生家做客。河先生向我出示一封柳姓朋友的信函。信是毛笔写的，用的是非常典雅的古汉语，大意是说，其父亲于某年去世，家人为之服三年之丧，本月某日，三年之丧完毕，家人将依礼举行禫祭，届时邀请河先生前往观礼云云。河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与他同行？我连声应诺。古人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过程漫长而又复杂，禫祭则是最后一次祭祀，祭后除服，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又称为吉祭。由于是除服之祭，所以极为隆重。“禫祭”一词，我在古文献中见过无数次，但始终无缘得见其仪式，如今居然可以亲临目睹，真是兴奋莫名。河先生告诉我，这位柳先生，乃是安东的名门望族，屡世簪缨，门庭颇盛，如今连柳家的住宅都是文物保护单位。柳家以恪守文化传统为荣，至今按照《朱子家礼》的规定生活，

其日，当我们从汉城赶往远在山乡曲村的柳家时，已是子夜时分。次日清晨，丧家开始陈设祭品。从文献的角度来检验，整个仪式简直无懈可击。例如，文献记载说，丧主之妇在禫祭中要穿彩服。彩服的样式，文献语焉不详，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无从质证，常常令人郁闷。始料未及的是，当丧主之妇在两位女眷的搀扶下到灵位前行跪拜之礼时，穿的竟然就是红色的丝绸彩服！我心头一震，连忙举起摄像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资料。

禫祭之后，举行迁庙仪式。《朱子家礼》规定，士大夫的家庙只能供奉四代先祖的牌位，所以每当三年之丧结束，新主的牌位入庙时，就必须将高祖的牌位迁走，以便保持四代牌位之数，这一仪式称为“迁庙礼”。韩国人几乎都有家庙，当新主迁入家庙后，历时一上午的仪式终告完成。回汉城的路上，我反复琢磨：家庙致祭的祖先为什么只能是四代？突然茅塞顿开，悟出了其中的缘由，欣喜无似！回国后，我写就了《论迁庙礼》一文，发表在杨向奎先生执教六十周年的纪

念文集上。这篇论文是将传世文献与“活化石”相结合的产物，完全不同于以往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虽然无甚高论，但在我而言，不免敝帚自珍。

还有一次是到庆尚北道观看“儒林葬”。在了解了“始死”和“禫祭”的仪式之后，我非常希望看到韩国的“儒林葬”。所谓儒林葬，是韩国人对朱子家礼中的丧礼的称呼。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韩国有学识举行儒林葬的家庭已经越来越稀见。我滞韩的时间非常有限，期间适逢儒林葬之概率，可谓微乎其微。不料宛如天佑神助，1997年初，在我还有二十多天就要回国之际，突然接到岭南大学友人金血祚教授的电话，说在大邱市附近的清道县，最近有一位朴姓的九旬儒者逝世，其家人和弟子决定为之举行儒林葬。当地媒体已经迅速做出报道，称这将是20世纪韩国最后一次儒林葬。我放下电话直奔汉城车站，冒雪赶赴大邱，承金教授和庆一大学崔景顺教授帮助，随即驾车前往清道朴家。闻讯前来吊唁的车辆已将丧家围得水泄不通。丧主和众主人跪坐在临时搭建的丧庐之中，一边不停地说着“哀告、哀告”，一边向前来吊唁的亲友述说死者临终时的情况。我在此见到了不同等级的丧服，以及以往读礼时每感到不知究竟的斩衰之服上的衰、负版、辟领；丧饰中的首经、腰经、绞带、散带等等，与朱子家礼的记载相比，一切都是那样的原汁原味。我在这里停留了三天，目睹丧家如何行朝夕奠的礼仪、如何制作丧具，如何告庙、发鞠，直到灵柩入圻。送丧那天，我举着摄像机，在积雪将融的麦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着，努力将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此生惟一能亲见的儒林葬。

类似上述的例子，不胜枚举。韩国受中国古礼的浸润如此之深，使我产生了从史学角度来做系统研究的想法。1998年，我以“中国古礼在朝鲜半岛的播迁和影响”为题，申请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获得批准。旋即开始写作，此即本书的由来。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儒家的治世之道是通过礼乐制度来展开的。因此，礼制的实施与儒家化的程度适成正比。朝鲜王朝

把全面实现儒家化作为治国的目标,其结果必然是礼乐制度深入到社会每个层面。换言之,正是礼乐文化的全面渗透,才造就了彻底儒家化的朝鲜。基于这一认识,我试图描述从三国时代到朝鲜时代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礼学和礼制怎样逐步被朝鲜政府和士民所收容,以及朝鲜民族如何走向儒家化。

在写作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对韩国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生疏,许多话斟酌再三犹不敢轻言;其次是不懂韩文,许多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著无法利用,深感遗憾。好在这一主题韩国学者着力不多,此外韩国的史书和古代学者的文集都是用汉文书写的,阅读原始材料并没有困难,因而本课题仍不妨一做。

本书各篇是在国内陆续撰写的,常常因为资料缺乏而掷笔中辍。2000年夏,我专程到汉城成均馆大学图书馆搜集资料。在整整一个月之中,我查阅了高丽时代、朝鲜时代所有学者的文集,复印了近百公斤重的资料。由于终日伏案,颈部肌肉严重受伤,又值酷暑,晚上无法入睡。现在回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令人唏嘘不已。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对韩国礼学的研究告一段落。在此,谨向帮助过我的韩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人初涉韩国学术,本书的粗疏和谬误一定在在多有,殷切希望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彭 林

2004年6月22日于清华园

目 录

弁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礼在三国时代的初步传播	(1)
一、纪元前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	(1)
二、三国时代朝鲜半岛的社会状况	(3)
三、高句丽、百济、新罗与中国的交往	(15)
第二章 高丽时代的礼制	(43)
一、高丽与中国的交往	(43)
二、成宗制礼	(47)
三、高丽礼制格局的形成	(50)
四、祭祀天神地祇	(51)
五、祭祖	(53)
六、丧服与国恤	(63)
七、文庙祭祀	(73)
八、军礼	(78)
九、宾礼与冕服制度	(81)
十、嘉礼	(84)
十一、佛教的兴盛与礼制的衰落	(88)
十二、高丽礼制检讨	(98)
第三章 论《朱子家礼》在朝鲜时代的播迁	(101)
一、朱熹与《家礼》	(101)
二、《家礼》的东传	(104)
三、《家礼》之研究	(106)
四、《家礼》的普及与推广	(117)
五、《家礼》的朝鲜化	(125)

六、朝鲜儒林家庭礼仪的范式化	(133)
第四章 朱熹礼学与朝鲜时代乡风民俗的儒家化	(138)
一、《小学》与《童蒙须知》	(138)
二、学令	(145)
三、乡约	(149)
四、乡射礼与乡饮酒礼	(159)
五、家范	(166)
第五章 《经国大典》与朝鲜时代的职官礼	(173)
一、《经国大典》对中国礼制的依仿	(173)
二、职官体系的规范化	(178)
三、官员的遴选与管理	(188)
四、典礼仪式	(193)
五、《经国大典》的治国思想	(195)
六、《经国大典》的阙失	(200)
第六章 《国朝五礼仪》与朝鲜礼仪制度的确立	(204)
一、《国朝五礼仪》的纂修背景	(204)
二、《国朝五礼仪》对中国礼制的沿袭	(207)
三、《国朝五礼仪》的“事大”礼仪	(210)
四、《国朝五礼仪》中体现朝鲜特色的部分	(213)
附录	(216)
第七章 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	(224)
一、清军入关前后的中朝关系	(224)
二、清初朝鲜人的夷夏观	(226)
三、乾嘉时期燕行的北学派学者	(230)
四、燕行学者对朝鲜的影响	(235)
第八章 朝鲜时代的礼讼	(241)
一、光海君继位的纠纷	(241)
二、追崇元宗	(243)
三、册封凤林大君为世子的争议	(250)

四、己亥礼讼	(250)
五、赵太妃丧服	(257)
六、朝鲜礼讼简评	(259)
第九章 寒冈郑述《五先生礼说》初探	(264)
一、生平与学行	(264)
二、《五先生礼说》述要	(266)
三、《五先生礼说》之编撰旨趣	(268)
第十章 丁茶山礼学与清人礼学之比较研究	(276)
一、以礼为天地之情	(277)
二、以《礼记》为七十子后学者之作	(282)
三、以《周礼》为经国之具	(285)
四、辩难郑注及贾孔之疏	(293)
五、创为新说	(303)
六、名物制度考释	(308)
七、馀论	(317)
第十一章 茶山礼学的两个特点	(318)
一、以经世为首务的《周礼》之学	(318)
二、以考证见长的《仪礼》学研究	(327)
第十二章 茶山的考据学	(333)
一、《梅氏书平》对伪《古文尚书》考辨	(333)
二、茶山对郑玄的臧否	(336)
三、茶山的文字考订	(341)
四、18世纪中朝考据学的比较	(345)

第一章 中国古礼在三国时代的初步传播

三国时代,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开始频繁进行文化交往的时期,中国的礼仪文明通过各种途径传入该地区,并影响当地社会,改变着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形态。

一、纪元前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

朝鲜半岛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旧石器时代。迄今为止,半岛既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北咸镜道雄基县的屈浦里遗址、南平安道中和县的祥原遗址、南忠清道公州的石壮里遗址、北忠清道堤川县的浦田里遗址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壮里遗址的两个文化层的年代分别为约3万年前和2万年前,“一般推测在距今约4万年到5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人类便已开始朝鲜半岛上定居了”^①。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朝鲜半岛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依,彼此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中国黄河流域的古文明进入并影响朝鲜半岛,至迟可以上溯到殷末周初。据《史记·宋世家》记载,商王朝灭亡后,武王封纣王的叔父箕子于朝鲜。这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关于大陆名贤到朝鲜半岛定居的记载。箕子东入朝鲜后,着力推广中原文化于当地,其举措略见于《汉书》: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其家

^① 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9月。

为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讎，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菹豆^①。

对《史记》、《汉书》中有关箕子的文献记载，古代的朝鲜学者多不否认。但当代南北韩学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箕子朝鲜之说，纯属于虚乌有，朝鲜开国，乃是公元前 2333 年 10 月 3 日，檀君王建在今日平壤之地所建之国。檀君朝鲜史称“古朝鲜”。

中国人大批进入朝鲜半岛，似在战国后期。当时，乐浪、玄菟从属于燕国^②，真番、朝鲜也在燕的有效控制之下：

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修复辽东故塞，至泅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泅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③。

可见燕国时即已略得真番、朝鲜。秦灭燕，此地属辽东外徼。汉初，因其地辽远，故边界仅划至泅水而止，为燕王卢绾辖地。其后卢绾谋反失败，卫满聚众东逃，故越过泅水，“居秦故空地”为王，以王险（今平壤）为都，史称“卫满朝鲜”。卫满朝鲜的臣民，除真番、朝鲜的土著外，尚有“故燕、齐亡在者”^④，“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到卫满之孙右渠王时，“所诱汉亡人滋多”^⑤。齐、燕、西汉之民大批亡入朝鲜，无疑加速了中国文化的东传。汉初，“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

① 《汉书·地理志下》。

② 见《汉书·地理志》燕国属地条。

③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④ 《后汉书·东夷列传》。

⑤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①。元封三年（前 108 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开玄菟、真番、临屯、乐浪四郡，是为“汉四郡”时期。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涉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②。到右渠王时，“涉君南阇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③。汉四郡时期，朝鲜半岛成为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中国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可想而知。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④。

汉四郡时期，活跃于朝鲜半岛其他地区的部落或早期国家，有扶余、涉貊、挹娄、高句丽、沃沮、马韩、辰韩、弁韩等。《后汉书·东夷列传》云：“涉及沃沮、句丽，本皆朝鲜之地也。”《后汉书·东夷列传》又云：“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属乐浪东部都尉，又其后臣属高句丽。东涉亦属高句丽。建武六年，东汉政府“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⑤。经过长年的彼此兼并，朝鲜半岛渐次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

二、三国时代朝鲜半岛的社会状况

公元前 57 年（西汉宣帝五凤元年），时年十三的新罗始祖赫居世即位，号居西干，国号徐那伐。赫居世二十一年（公元前 37 年，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始祖东明立。赫居世四十年（公元前 18 年，汉成帝鸿嘉三年），百济始祖温祚立。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史称“三国时代”。公元 663 年（唐高宗龙朔 3 年），新罗灭百

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② 《后汉书·东夷列传》。

③ 《后汉书·东夷列传》。

④ 《后汉书·东夷列传》。

⑤ 《后汉书·东夷列传》。

济,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新罗灭高句丽,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935年(后唐废帝二年),新罗亡,高丽时代开始。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年代跨度,大致与中国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相当。

有关三国时代的历史状况,当地没有直接的文字史料传世。所幸者,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志》、《魏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中有若干记载。这些记载或得自三国来华使者的叙述,或采自中国官员出使朝鲜半岛的闻见,故弥足珍贵。流传于世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是晚至高丽时代才撰成的作品。《三国史记》五十卷,金富轼著,作于1145年,乃摭拾裒集中国史书中的有关资料,补苴、完善而成。《三国遗事》为13世纪80年代高僧一然所作,系据古代传说和野史编撰^①。

汉魏时期朝鲜半岛的社会历史,还残留着浓厚的传说时代的色彩。如关于朴姓新罗王始祖的来历,《新罗本纪》云:

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焉,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言王^②。

^① 比较两书,《三国史记》的可信性优于《三国遗事》,但疑问依然不少。如新罗王脱解尼师今在位二十四年卒,由儒理王第二子婆娑尼师今继位。婆娑尼师今在位三十三年卒,婆娑王嫡子祇摩尼师今立。祇摩尼师今在位二十三年卒,儒理王之长子逸圣尼师今立。上记《新罗本纪》记载的王世,恐有疑问。儒理王既言“以年长且贤者继位”,那么,为何脱解王不传位于年稍长的儒理王长子,而要传位于年稍幼的儒理王次子?若次子二十岁即位,则长子之年必高于此;婆娑王、祇摩王共在位五十六年,则儒理王长子逸圣王即位已将近八十岁,耄耋长者,势所不能。逸圣尼师今在位二十一年卒,长子阿达罗尼师今立。逸圣王卒时,年逾百岁,若其二十岁得长子,则阿达罗王继位时,年纪当在八十以上。《三国史记》云“阿达罗尼师今在位三十一年”,则阿达罗王之卒,寿在一百一十以上。如此父子相继为王,年齿均在百岁以上,恐举世罕见。

^② 《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卷一。以下凡引《三国史记》一书的《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者,均省略书名。

无独有偶，新罗另一大姓昔姓始祖脱解王的降诞，同样充满神话色彩：

脱解本多婆那国所生也，其国在倭国东北一千里。初，其国王娶女国王女为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弃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宝物，置于楛中，浮于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国海边，金官人怪之不取。又至辰韩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时海边老母，以绳引系海岸，开楛见之，有一小儿在焉。其母取养之。及壮，身長九尺，风神秀朗，智识过人。或曰：此儿不知姓氏，初，楛来时，有一鹤飞鸣而随之，宜省鹤字，以昔为姓。又解楛楛而出，宜名脱解^①。

高句丽是夫余的别种，世祖为朱蒙。在高句丽民族的传说中，朱蒙是半人半神的人物。《魏书·高句丽传》记载朱蒙出生始末云：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于犬，犬不食；弃之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剖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

朱蒙故事也见于《三国史记》，而有所加详。类似的记载尚多，足见当时的朝鲜半岛，尚处在传说时代的后期，故神人杂糅，难以据为信史。汉四郡之外的地区，其社会组织，呈现出早期国家的形态，文献记载云：

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

^① 《新罗本纪》卷一。